

从媒介工具性到技术本体论： 西方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

张爱军，乔运涛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 710122)

摘要：智能时代到来，传统的以“工具化”媒介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的政治性将不再适用。西方生成式智能不仅仅是存于现象学视野下的效率工具，更需要借助关于技术物的一种“本体论”视角的切换来分析其政治性。文章通过对生成式智能“本体”的分析发现，技术作为独立体系具有政治建构的特质：生成式算法下的体系控制、智能算力下的政治不平等与数据化机器式的掠夺化生产等。生成式智能的技术物本源与数字帝国主义观念呈现出一种接洽。数据化趋势与平台扩张观念不谋而合，霸权国家数字权力垄断风险下的压迫与歧视，甚至基于智能优势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形成资本主义联合的超帝国主义风险。由此，对于技术后果的讨论，将最终回到机器与资本关系之间的初始语境：技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技术公共建构的悖论。

关键词：工具论；技术本体论；生成式智能；数字帝国主义；技术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4) 01-0031-09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作为早期生成式智能的代表，ChatGPT于2022年11月30日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该款生成式智能以新型技术形式与产业象征，引领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风向标并风靡全球。随着ChatGPT的“走红”，越来越多种类与用途的生成式智能应用出现在市场中，以供用户选择。尽管生成式智能仍处于工具性的发展与定位阶段，但对于以ChatGPT类技术后果的讨论在学界已成热点话题。

与多数人所默认的一样，科学技术自发明以来，便有着服务于人类及社会需要的“工具化”天性。这种“工具论”倾向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1]。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也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应用服务或增强的关系。然而，当现代技术展现出超越“工具性”之外的系统性风险，如对人类本体的反噬：“新媒体技术持续地将机器、网络的逻辑与有机体人类的逻辑杂糅来塑造新型人类”^[2]，人们则会担忧技术的滥用与不可控而展现出一种焦虑。如何理解技术，从纷繁的现象晕轮中直达其要害，是破解技术后果迷思的关键。

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工具性”与“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直面技术本体的政治性后，进一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审视生成式智能中的数字资本主义倾向，彰显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关系的遮蔽，更为客观地理解数据、算法、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与政治资本、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为真切地理解技术对现实的改造。

一、直面技术的政治本质：从工具性到本体论的视角转变

数字技术与政治传播关系之密切是探讨政治与技术相勾连的一个基本共识，“数字化时代对于政治

传播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持久地、永不见底地改变着现有以及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3]。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承认。如何理解这种关系，作为分析技术性后果的两种范式，“工具论”与“本体论”分别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尤其是随着数字智能展现出超越以往科技表征的“类人心智”，工具主义是否还能诠释智能技术的政治性本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机器服从：一种媒介工具性的视角

尽管智能技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火热，但对于技术是什么、有何影响的思考早已有讨论。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作为描述技术的价值关系视角之一，“工具论”是一个古老而又持存的话题，也有学者称其为“使用研究”^[4]。“工具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的表述：一是人控制技术，技术并非自主不受控的；二是技术是价值中性的；三是技术展现出负面后果时，不应被归责。^[5]“工具论”的视角对技术本体有一种极大的宽容，即技术是中性存在的。技术所导致的所有正负面后果都因人而发生，由人而负责。而且，技术“工具论”内置了一种技术服务于人的目的，人能绝对把握对技术命运的想象。如“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纯客观地依据用户问题生成内容，实质是根据人类制定的规则训练而成的有立场、一定程度上受控的智能内容生成工具”^[6]。技术负面后果的发生，则归咎于人的有限与缺憾。

作为技术工具论的坚定批驳者，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为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7]。他认为，技术并不是目的与手段，或是人的行为，技术有自身的目的。海德格尔用“促逼”“持存”“订造”等词汇来描述技术对人的裹挟，其含义可以概括为：人归属于技术的命运，并无法从中抽身。如果人们只关注到技术的某一个层面，尤其是站在技术的工具主义立场上，那么在处理技术与其社会控制问题时就会束手无策。

在确定政治与技术关系之时，将生成式智能视作为“媒介工具”的思考方式，注意到了技术在社会场域中的可塑性，并预设了完备的解决方案，但很难对其社会后果做出恰当准确的判断。具体一点说，从现实经验而言，技术尽管多数以“媒介应用”的形式作为一种工具角色而出场，但因为所展现的目的不同，技术呈现的角色路径也不同。因此，对于技术后果的讨论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且悬而未决的结果。探讨智能技术的物质性本体是否能自觉与政治进行之间进行勾连，“工具论”式机器服从的观点忽视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特定生产关系的耦合。从这一点上而言，以存在论或者说本体论的视角来探究技术或许更加合适。

（二）技术本体论：技术作为独立体系的社会建构

“媒介”主要体现传播的媒介表现与功能，“技术”本体则主要考虑体现在存储、计算与分析等主要形式与运作方式。胡咏对本体性技术的研究总结道：“围绕特定传播工具展开，以对技术、应用的介绍为基础，对其传播特性进行总结分析，再对这种传播特性所造成的可供性以及个体、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4](152)}。可以说，本体性研究是传播研究的根本。在技术哲学领域，技术本体论与存在论互相牵涉、不分你我，是因为技术是否存在和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往往是两个相联系且息息相关的问题。马克思透过技术表面直达物质形态，揭示了技术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存在方式以及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性关联。^[8]海德格尔则重点分析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指代的是人与存在关系中发生的、由技术发展引起的重大变化，由此表明技术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采用“本体论”的方式探究技术本质对于人与社会的后果由来已久。

当技术成为一种显著性存在时，人机关系发生逆转。马克思对技术存在进行区分，使之划分为“工具”与“机器”。“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9]。在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技术不再作为人的主体性服从角色，成为由技术转化为作为占有机器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代理人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手段。就越来越强大的机器体系与越来越隐

没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属性而言,表面上人操控机器的实质转化为资本关系控制人。机器不再是作为工具,反倒成为控制人的一种关系与手段。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本体异化成为一种异样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马克思从机器关系的角度推翻了工具性的技术迷思,那么海德格尔则充分认识到技术是现代最突出的一种现象。技术脱离了人给予它的外在意义,内生了自身存在与建构系统,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技术是真理的开显方式”^[10]。或者说,“技术是一种解蔽的方式”^[11]。解蔽是从遮蔽状态进入无蔽状态,是自然之物由人工带出的涌现过程。在技术的运转模式之中,存于社会零落的物成为技术持续运转的本源动力,形成对自然与社会的构造系统。从这一方面而言,技术早已脱离了一种“应用”或者“工具”的角色,而作为主人在独立发挥着作用。以政治为目的,而是技术内生的政治性,由此开始显现。

(三) 直面技术的政治性: 一种视角的切换

尽管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已不可避免,但我们探讨技术时,总是以媒介的工具形态来探讨对政治的影响。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天真地想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其理论前提是认为,技术逃脱不了人的手掌心,技术只能在人的控制下为人类谋取福利。如果人能够在技术发展中给技术以方向与定位,那么人应该能够以此为目的来控制它。但是技术社会中,价值与意义由技术的自主逻辑决定。如果“工具性”能恰如其分地描述技术的本质,准确表达技术与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那么技术治理将毋需进行。

而且,政治的工具性影响实质上是来源于技术的本体如何存在,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工具性”与“本体论”对技术政治性关系讨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工具性认为政治是目的,工具是手段,工具的一切负面后果都来源人的欠缺。而“本体论”认为,技术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技术本体有可能会天生契合了某一方的利益。正如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阐述的,“网络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12]。技术在服务于人的同时,也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即技术政治。胡泳等谈到,如果“本体研究是研究的根本”,那么随着技术本体逻辑更迭,基于媒介学的整体效果线索应展现为“传播工具变革—传播方式变革—生存方式变革+传播关系变革+价值关系重构”^[4]。这印证了技术不可能脱离社会场域而孤立存在,讨论技术化政治的关键是回溯技术本体与社会的关系。

庞大社会体系下,存在技术之维所构成的人类运行规则。技术逻辑内嵌社会的运行规律,并将技术视为社会行动者去创造并占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技术以实现社会秩序建构或改造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马克思眼里,技术本体尽管是不变的,但存在的可能性是被塑造的。一方面,它有可能成为压迫人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把人从压迫与劳役中解放出来的条件。具体来说,要看技术文明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就传播研究而言,摆脱视基础设施为“真空”的媒介无意识,直面媒介本体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已不可忽略。

二、从技术本体出发: 西方生成式智能的政治建构

技术已非人的奴仆,也并非仅仅从属于工具。既然对于技术政治性的挖掘无法回避本体的研究路径,技术也无法脱离社会场域存在,那么为更准确地把握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下的生成式智能,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以算法、数据与算力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底层基础设施究竟如何重构了政治关系。这需要借助生成式智能对社会整体传播结构的改变来得以窥视。

(一) 从生成式算法到智能体系控制

无论是分析式抑或是生成式智能的技术发展模式,都构筑了一种对人类存在的统御。这种技术统御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于机器的批判。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体系统治工人不可避免,技术工业就

自然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发展早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通常的、物质化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3]。马克思用“机器体系”这个词汇来形容技术作为控制力量的形态。“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4]。以机器大工业为外化形式的技术体系绝不是可以由人任意操纵的工具。相反,这个技术体系已经成长为操纵人、统治人的力量。

在生成式智能出现后,以数字化时代为背景的“智能体系”已远远超越机器体系,继续将不可察觉地与资本属性进行交叠、融合与碰撞,并不断抢占人的主体性。存于工具性视野的机器并不会主动创造价值。在马克思看来,是工人和生产对象借助“机器体系”把自身原有的价值转移到由其所生产的产品上进行资本再增殖。在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机器的进化与革命必然沦为资本家榨取超额利润及全方位控制劳动者的手段,而这种动员在数字时代技术编织的大网下变得愈发简易和高效。

当智能体系卷入下,技术的进步成为一种目的时,人的命运会被暂时搁置。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处在象征着尖端科技的跨国巨头,工人仍无法逃离过去工厂劳工似的命运。在以机器体系为主导的技术迭代中,不断出现“技术性失业”。技术日渐精进的后果在于让雇佣劳动者不敢去与资本作太多的抗争,因为他们可能随时被越来越灵性的工具取代。除此之外,生成式智能的更迭还需要依靠使用者的无意识劳动。“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者与数字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者需要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才能对数据进行复杂化加工以生产一定的数字产品。”^[15]生成式智能的迭代与进化依靠用户对AIGC内容的不断使用反馈来逐渐修正,这对参与其中的使用者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数字劳动。OpenAI明确说明输入ChatGPT聊天框的文本内容会被用于进一步训练模型,同时不断收集参与者与使用者的行为数据。这指明,用户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作为人工智能无意识的数字劳动者,为AIGC提供机器养料,从而使AIGC更加强大。

生成式智能与分析式智能相比,更深层的区别是智能体系对人更深度嵌套。分析式智能时代,人对于机器的辅佐尚不明朗。生成式智能的来临,人服务机器智能的成长越来越成为一个共识。尽管生成式智能的确可以提高效率,但存于效率之后的是:人类的情感、行为、经验与理性等等一切皆可以被计算与量化,成为喂养生成式智能的原料。在西方资本场域下,算法权力填充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将生命的所有数据痕迹卷入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体系中。生命由此沦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原材料”。

(二) 由智能算力差异到政治不平等

数字不平等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现象被列入学术与政治议题,并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推动而备受关注。理解数字不平等之间的主要视角是“数字鸿沟”。随着数字智能的兴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寻求经济利益和扩大社会福利,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鸿沟也日益明显。“智能鸿沟”作为数字鸿沟的补充而被学者们广泛提及,有学者认为:“商业逻辑作为主导性逻辑是智能鸿沟的重要特征之一。”^[16]这是因为算力、数据等主要数字资源主要集中在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互联网超级平台手中,所以这些平台有着天然的垄断性与封闭性。

算力是智能机器的底座,智能算法的运作离不开算力系统的支撑。算力是催生技术运作的动力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基本的数据分析、计算与存储能力,为内容生产、制作和传播全流程提供底层式的支撑。“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表现形式,正深刻影响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走向,进而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7]可以说,算力被视作为一种资源式的权力。

算力平台提供生产力的同时也簇拥新式的数字权力形成,加深数字不平等。算力平台往往由西方数字垄断巨头把持,它们控制着数据的生产、存储和传播的关键节点。作为一种基础资源,算力的提

升又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支持。国家间的数字竞争必然包含算力竞赛,“算力直接体现在超算中心、数据中心的数量,但背后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是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18]。这就意味着算力与经济、政治与国家政策等综合要素相联系,相对落后的国家算力水平难以追逐发达国家。但拥有算力的数字平台立足于民族国家,其影响范围却可以触达全球每个角落,落后国家从而失去在算法、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话语权。

当全球化的公共智能被某一国家所掌握,割裂由此产生。核心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财富的获取便不再是通过土地或生产方式的控制,而是通过知识与专业技能。互联网为这种权力发挥影响提供了潜在的手段。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脑力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9]。数字社会,知识载体日益丰富,成本也在急剧下降,社会平均的智力和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算法通过大数据的提炼,对我们的行为从已有的事实中寻找依据,那么基于优势地位的霸权话语则自然地隐喻于其中。意识形态通过“描述”试图去控制这个世界,也希望通过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影响世界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它们的意义结构成为一种现实。ChatGPT等生成式智能的诞生,更是促进了数字资源的不均衡,使得西方数字垄断巨头通过支配国际数字分工获得高额利润,且有可能使公共化的智能媒体成为构筑符合自身需要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机器。

(三) 由数据化机器到掠夺化的生产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0] 劳动资料的形式直接决定着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就存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处于智能时代,一切卷入数字场域中的生产活动自然不能脱离数据来讨论。可以说,数据是智能机器运行的根本要素,由大语言模型算法喂养的 ChatGPT 所需要的数据更是无法计算。尽管如此,数据并非存于赛博空间中的无主之物。目前,欧盟自 2018 年以来先后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据治理法案》等法案及我国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都规定了数据主权保护的相关制度。人们流转于诸多的数字平台,在享受数字生活的同时也留置了个人化的数据,机器将他们圈定在特定领域中,将其转变为虚拟的数字人,使其难以觉察算法权力对社会无处不在的数据化与数据搜刮。

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搜刮成为生成式智能提取数据的主要方式。也有学者称之为“数据掠夺”,“泛指对一切形态的数字资源的攫取”^[21]。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升级发展的时代,数据成为新时代的“原油”,具备重要的商品化价值。数据化成了数字生活的根本,算法平台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治理都仰仗于对数据的无休止、无底线的采集或萃取。自 ChatGPT“走红”以后,世界各国的公私部门意识到已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 OpenAI 直接使用。这种做法损害了主权国家的知识产权并产生数字安全风险。各大数字巨头,如谷歌、Facebook 等,同样基于掠夺个人数据的运作模式将个人数据纳入商品化驱动。但生成式智能的到来,使得数据化的范围从个人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从个体所有的社交、消费、娱乐行为到门户网站、公开信息与电子资源都可以被隐形的数字机器记录并窃取下来,成为一种提取经济价值并产生利润的资源。令人乐观的是,这一法律漏洞正逐渐被弥补,2023 年 5 月 23 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颁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训练数据作出明确规定:“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22]

除此之外,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还存在着由于投入训练数据的偏向引发的歧视问题。GPT-3 模型的预学习数据量已达到 54TB,约等于 2.25 亿本小型平装书。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既有的知识尤其是几乎所有英文类知识,无论优劣善恶都可被 ChatGPT 毫无区分地吸纳。很多用户可能不在乎生成式智能传达是经过验证的事实,而在乎机器人传达的感情偏向与价值观。江潞潞认为:“机器人之所以有所谓的阴影人格,是因为其训练模型源于开放网络。”^[23] 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深化、各类偶然性事件的凸

显,数据化实践再也不能涵盖全部。智能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加剧还是缩小,不再取决于人类对技术的实践方向,而是取决于人类对技术的认知。技术不再是人手里的提线木偶,它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必然拿走一些东西。技术代表的不仅是工业时代的生产效率,还带有后工业时代政治与社会建构的隐喻,数字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剥削的生产方式初现端倪。

三、技术与观念的接洽: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原本旧的研究范式已不能适用当前的新情况。英国社会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美国学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等人提出的“数字帝国主义”,描述了利用数字技术、媒体平台、信息数据等方面优势地位进行“垄断”与“掠夺”的进化路径。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积累逐渐由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积累向数字资本积累转变,^[24]竭力掩盖数字霸权和数字平台垄断背后的资本剥削和压迫^[25]。无论是算法、数据或者是算力,都已不能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载体,而是暗含政治竞争与生产剥削的外化之物。

(一) 数据化趋势下的平台扩张观念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要运转起来需要三个要素: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每个要素都涉及“劳动”的概念。这些要素分别对应于资本运行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和劳动者。后资本时代,存于数字寡头与资本主义视野下的生成式智能的数字生产,其本体的数据、算法与算力担任角色与人的“劳动”之间关系已混淆:用户既是劳动者又是原材料,既是机器的享用者又是资本机器的被剥削者。数字资本主义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牟利的路径,这种数字化路径将人类生活置于一种以技术至上为表征的特殊市场逻辑之下。用美国学者席勒(Dan Schiller)的话说,“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广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这一体系的代表,而且也在影响着该体系的结构与发展”^[26]。这种体系的表层,是作为“媒介、技术与资本”的平台,正因为如此,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模式,连带着技术创新、数字主权与劳动力生产的外化功能。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台的扩张,智能平台与数字化的生产方式相互依赖。

机器无法脱离工厂化的平台进行运动,工厂站立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运行。那么,资本扩张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同样代表着资本化的加深。“机器资本化”应用的直接后果体现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其本质是技术性扩张与工具式服务之间的认知差异。人类正在经历的就是席勒所言的特殊的数字资本主义,其典型特征体现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26](5)}。在未来,随着整个社会数据化程度不断提升,人的身体数据和行为数据将成为重要的资产积累对象。一方面,既有资本主义商业化运营模式仍在继续,它通过将自身建构成“规则设定者”而逐渐合法化自身对个人化数据的使用;另一方面,技术所引发的政治性、社会性的网络话语使其自身逻辑得到合法化,平台利用自身商业模式运营,拉拢消费者,并与消费者形成“合谋”,在默许基础上获得了数据的使用权。生成式智能会加深这种“被数据化”的趋势,人们更无法逃离成为“机器”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资本的扩张与数据化的趋势成为一体化的行动。

(二) 霸权国家的数字权力垄断风险

数字帝国主义尽管根植于数字化、智能化与生成化的生产方式,其剥削与掠夺的帝国主义内核尚未发生改变。有学者认为数字帝国主义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表象与具体的运转方式,尽管信息科技不断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及革新升级,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社会逐步向数字时代演进,但“以通过资本增殖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变”^[27]。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其表现是垄断资本主义渗透进数字领域与之结合共谋,数字技术就沦为资本攫取利润的重要工具。从本质而言,数字帝国主义并未脱离初始语境,智能的社会建构逻辑与现代资本扩张

运行的方式相互耦合, 智能技术则成为探讨站立在西方地缘政治视阈下国家霸权的衡量原点。

“数字帝国主义”指明了技术媒介已成为帝国霸权的指涉与大国博弈的重心。更直白地说, 技术不是竞争的手段, 而是竞争的目的。以智能科技为代表的数字权力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 更指代国际场域中的国家垄断与反垄断的政治实力对抗。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认为, 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28] 数字科技已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度互嵌, 科技变革或迅速引起一系列的产业链、价值链调整, 继而外溢到各个方面, 从而助力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飞跃性进步。无论是研发资助、大数据调用与算法治理, 还是产业链部署与人才培养, 都难以想象其能离开民族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权力的主导。以 ChatGPT 与 OpenAI 为代表的美国人工智能的勃兴, 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势必将强化巩固霸权国与他国本就存在的权力等级秩序。从“斯诺登窃听”到 2023 年 4 月的美国国防部“泄密门”,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 科技与政治从来不是分离的关系。数字化趋势下各种平台和 APP 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 实际上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前进动力。那么, 面对全球指向的生成式智能中垄断风险, 数字主权与安全问题将显得更加紧迫。

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具有内在的共契性。二者殊途同归于增殖和求利的共谋之中, 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汇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奏曲。以资本逻辑对技术进行重构, 技术成为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 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生产力。技术成为资本权力的统治工具, 资本权力经过技术的包装具有了工具合理性。这启示我们, 对资本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分析与批判, 离不开对技术要素的剥离与挖掘, 认知某一特定技术的生成与建构逻辑对于技术资本化的整体认知具有必要性。

(三) 数字优势下歧视与压迫隐忧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资本的跨国分工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分析资产阶级本性的观点得到了更新和修正。其代表是 2000 年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他们认为, 现在的帝国已是一个平滑的空间, 权力在那里没有确定的场所——权力处处存在, 权力所处的空间却消失了。^[29] 这种超帝国主义思潮实际上指一个新型的超国家的联合政体将出现, 来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统治。而且, 这种思潮认为民族国家阻碍了世界资本、商品和货币的自由流通, 阻碍了自由、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帝国的形成使得自由、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得以实现, 并且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尽管由于地缘政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资本主义阵营的联结尚未发生。但数字智能的出现, 正在使全球“数字资本”自然联结成为一种现实, 并形成对数字弱势国的一种压迫。“超级帝国主义”正在接近现实。其中智能技术的结盟是例证之一, 美国将与其伙伴国家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技术联盟”, 共同制定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规则、新标准, 进而实现对新科技塑造权力的掌握。^[30] 这种技术联盟将利益相悖与相对弱势的国家拒之门外, 形成技术资本共同体。算法权力为了实现扩张, 必然寻求资本的联合。对于资本共同体之外, 仿佛资本权力一般具有了自己的生命潜能, 试图在数字化空间中将一切的人与物算法化来实现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 智能机器的时代正在成为数字资本们相互联结的通道。与传统基于特定场域的权力剥削样态不同, 这种智能技术的资本联盟也有可能是非显化的, 是凭借智能技术实现对数据的占有、解码和建构所形成的帝国主义扩张。

对此, 尚未拥有智能, 或者说无力积极参与数字化产业之外的国家被排除于“资本主义”建构的数字体系。去中心化、不明显的平等开始产生。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 最重要的不是偶然性的商品交换, 也不是个别性的货币使用, 而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一个生产和交换体系。一种以用相等的劳动量

来衡量的生产和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这个智能化的体系反过来贯穿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让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来衡量。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不幸的是，有些国家因为无法参与相等的价值交换，只能去服务于数字下游产业。OpenAI 曾被曝出在肯尼亚以低于2美元的时薪雇佣工人进行数据纠偏的工作。卷入数字时代的所有生产要素，包括所有个体和物都不可避免地数据所中介化。只有在数据的坐标系上，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及衡量价值，但仍有一些群体位于坐标系的底端。在清晰洞察数字本体的帝国主义运行逻辑之后，当下紧迫的任务是在充分理解其内在驱动的资本力量以及现代技术差别下的垄断化和霸权性的风险基础上，限制西方资本逻辑对技术本体的无限扩张。

四、结语：追问技术的政治性后果

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本质，冠以技术之名的文章《技术的追问》作于1953年。在他的行文中，将原子弹爆炸作为现代技术时代来临的标志性事件，和原子弹一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跨时代的产品，算法、大数据与机器人等等一系列现代技术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凸显更是印证了这句描绘技术重要性的名言：“技术成为‘座架’，成为现代人的命运”^[31]。时至今日，如何理解新技术，就是理解现代人的命运。同时，海德格尔还指明：“这里，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11](1238)} 在这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听任技术的危险后果不断释放，而这些后果往往伴随着技术的各种成功表象。如何预判生成式智能所产生的未来风险，将是一个急切的问题。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所得出的答案便是作为一种表意的效率工具所展示出来在特定领域出现的负面后果，关于技术的理解从而会陷入一种浅表式的“误用”。如若希望在纷繁复杂的技术原理中理清一丝关于技术“物”的本真，必须借由智能的本体或其存在来分析。从本体性的技术脉络探查存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成式智能的数字帝国主义风险，印证了机器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改变。“当人的自由、解放被寄希望于通过日益扩大的网络 and 连接而实现，数字资本主义所遮蔽的真实社会关系也就被视而不见”^[32]。

从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来看，数字帝国主义危机仅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问题之一，而整体性人类族群所面临的共同遭遇更值得关切。超越性的技术给人类提出了与以往非同一般的谜题，如技术、资本与权力归属之间的关系。无论技术的社会关系如何演化，我们总是希望其能将人类带到精神自由与肉体解放的跨越式结局。对此，马克思早已说明技术的发明、运用与进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解为对社会宰制和霸权关系的批判，那么对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终点也必将是批判技术异化所带来的宰制，从而走向解放。那么，对任何一种技术而言，是人类解放抑或是技术压迫与其本体的公共性与占有的私有制之间的天生悖论促成了讨论人类命运的参照。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批判逻辑，克服数字异化社会的危害，将意味着劳动、生活甚至精神自由都可以从数字化的限制中获得解放。那么，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终结将允许每个个体充分发展其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解放。

参考文献：

- [1] [美]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 [M]. 韩连庆, 曹法观,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 [2] 孙玮. 媒介化生存: 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 [J]. 探索与争鸣, 2020 (6): 15-17+157.
- [3] 荆学民. 数字化时代的锐度与限度对政治传播的意义 [J]. 新闻与写作, 2023 (5): 1.
- [4] 胡泳, 陈磊. 网络传播研究述略: 从本体研究到规范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1): 143-152.

- [5] 程志翔. 何谓技术工具论: 含义与分类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9 (4): 75-81.
- [6] 陆小华. 智能内容生成的实质、影响力逻辑与运行范式——ChatGPT 等智能内容生成现象透视与解析 [J]. 新闻大学, 2023 (4): 17-24+119-120.
- [7] [德]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5.
- [8] 刘日明. 马克思的现代技术之思 [J]. 学术月刊, 2020 (4): 23-34.
- [9]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486.
- [10] 孙玮. 微信: 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J]. 学术月刊, 2015 (12): 5-18.
- [11]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931.
- [12] [英]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571.
- [13]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2-193.
- [14]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27.
- [15] 黄静秋, 邓伯军. 数字劳动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阅江学刊, 2023 (4): 28-40+170.
- [16] 钟祥铭, 方兴东. 智能鸿沟: 数字鸿沟范式转变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 133-142.
- [17] 章玉贵. 算力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与战略思考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5): 101-107.
- [18] 鲁传颖. 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3 (5): 37-43.
- [19]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6.
- [20] [德]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0.
- [21] 刘皓琰. 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 (11): 143-154.
- [2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23] 江路璐. 智能交往, 未来已来——“激荡 AIGC” 数字交往八人谈观点综述 [J]. 传媒观察, 2023 (3): 48-54.
- [24] 陈尧.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垄断资本积累、空间权力扩张双重视角 [J]. 理论月刊, 2023 (9): 84-93.
- [25] 唐莉, 邓锐.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 [J]. 学术界, 2023 (8): 91-100.
- [26] [美] 丹·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 [M]. 杨立平,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2-15.
- [27] 白刚. 数字资本主义: “证伪” 了《资本论》?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4): 53-60.
- [28] [英] 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 李春兰, 杨柳. 冷战结束以来的帝国主义论评析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7 (11): 8-14.
- [29] [美]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M].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90.
- [30] 唐新华. 西方“技术联盟”: 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1 (1): 38-46+64.
- [31]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9.
- [32] 宋建丽. 数字资本主义的“遮蔽”与“解蔽”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 (18): 88-95.

[责任编辑: 高辛凡]